

博
学
文
库

BO XUE WENKU

三四十 年代 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

张娟/著

本书所讲的现代市民小说主要产生于三十年代。经过一段时期的孕育与转型，三十年代，三四十年的上海，以经济发展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一种迥异于传统乡民价值观的现代市民价值观，这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学秩序，出现了具有商业特征、迎合现代市民审美情趣、反映现代市民价值观念的现代市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本书受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



BOXUE WENKU

三四十年代 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

张娟/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张娟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664-0205-9
I. ①三… II. ①张…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2845 号

本书受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 张娟 著

Sansishi Niandai Shanghai Xiandai Shimin Xiaoshuo Jiazhi Chonggo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52mm×228mm
印 张: 17.5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ISBN 978-7-5664-0205-9



策划编辑:王娟娟 马晓波
责任编辑:王娟娟 马晓波
责任校对:程中业

装帧设计:张同龙
美术编辑:李 军
责任印制: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65106311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节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概念界定	[001]
第二节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价值观内涵 ..	[014]
第三节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的内涵	[033]
第一章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物质语境	[037]
第一节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宏观物质语境	[038]
第二节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城市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	[044]
第三节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传媒空间	[057]
第二章 市民想象: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内容构型	[077]
第一节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生活的平面想象	[078]
第二节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灵魂的深度想象	[088]
第三节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精神的超越想象	[100]
第三章 物质修辞: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形式新变	[120]
第一节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空间修辞	[121]

第二节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恋物特征	〔136〕
第四章	性别特质: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女性风格	〔152〕
第一节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女性气质的文本表现	〔152〕
第二节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性别特征的形成原因	〔163〕
第五章	都市漫游者: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主题研究	〔174〕
第一节	都市漫游者的理论谱系	〔175〕
第二节	作为文学主题: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中的都市漫游者形象	〔178〕
第三节	作为写作方式:以都市漫游者为中心的叙事方式	〔203〕
第四节	都市漫游者与现代市民价值观	〔219〕
第六章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文学史意义	〔228〕
第一节	文学定位: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独立品格	〔228〕
第二节	雅俗互渗: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美学追求	〔245〕
第三节	道德反思: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当代意义	〔257〕
结 语		〔261〕
主要参考文献		〔264〕
后 记		〔273〕

导 论



第一节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概念界定

中国市民小说研究一直是学界之重要课题,前人研究的丰硕成果,为我们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市民的性质、内涵特别是价值观念产生巨变,传统研究亟待跟进,本书旨在关注由传统“市井”发展而来的现代市民,从价值观转型角度对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进行深入探析,并在此基础上重构其文学价值。在传统的左翼的意识形态视角、救亡文学的社会视角、自由主义的精英视角之外开辟一个全新的经济视角,通过经济发展基础上“人”的变动,揭示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学在展示真实人性、世俗价值上取得的独特成就。

本书导论部分试图构筑以现代市民价值观为中心的“现代市民小说”概念,认为以现代市民为描写对象,在评判标准上反映并且肯定现代市民价值观的小说创作就是现代市民小说。并对本书的研究对象给予时间和地域上的规定,将探讨的主要范围集中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现代市民小说。尝试建立以经济视角为基础的市民文学史观,并借助在现代市民价值观下全新叙事方式的构建,探索书写惯常“大历史”之外另一种书写方

式的可能性。

要界定“现代市民小说”，首先要厘定的是“市民”概念。何谓“市民”？“市民”是伴随着城市的出现而出现的，因而，“市民”也就是“城市之民”。“城”最初仅指旧时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后来则发展成为一种居地概念，《说文解字》中就有“城，以盛民也”的解释。“市”的原初意义是指交易或集中做买卖的地方。如《易·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盐铁论·本义》中又有：“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市”在一开始就有集民、聚货的含义。所谓“市民”，也就是以商业交换为生的一个社会阶层的总称，是指随着城市的发展形成的以交换为谋生手段，以工业生产提供的商品为生活资料的社会阶层。他们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形成了新的市民价值观。

首先，我们习惯上对市民的认识，往往混淆了“市民”与“市井”的概念，忽视了“市民”内涵的精神性。“市井细民”也就是“小市民”，是中国特有的称谓，是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形成的。“市井细民”居住在城市，但不是市民，而是具有传统乡土观念的由乡向城转变的具有过渡性质的社会阶层。他们一般处于社会中下层，是所谓的从事小手工业的“引车卖浆之流”。中国传统文学史中的“市民”概念其实就是宋元以来的市井之民。它“并不等于现代西方学者用以定义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市民。19世纪初期欧洲主要国家(如英、法等国)的市民生活已经建筑于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据此马克思称近代以来的欧洲市民社会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比较之下中国前近代以来的市民尚未获得充分的资本主义生活经验，因此20世纪初期中国的市民和农民都还未最终突破传统四民(士农工商)的历史范畴，也就是说前近代以来的中国市民仍可

以生活于市井中的农民视之”。^①但在我们约定俗成的概念中，市民往往被简单等同于城市居民，他们的精神属性和道德观念被忽视了。事实上，只有具有市民精神的市民才能叫作真正的市民。“中国的市民都是由乡民转化而来，他们是带着传统的文化观念来到快速扩张的城市中的城市人”。^②这里所讲的市民就是“小市民”，也就是生活在市井社会之中、具有传统道德观念的“市井细民”。他们基本上是从乡民转化而来的，虽然居住在城市，从事小手工业，但精神上还是传统的、乡土的。由于中国市民文化的不发达，造成了“在中国城市史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是宫殿和城市的工商业产生、发展史，民居、市民的生存空间和生活状况、精神状态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即使他们被谈到，也是在与经济商业活动的关系中被提及，市民生活被市井生活所代替，无形中，市民也被市井所取代”。^③

其次，缩小了“市民”外延。以往一些学者把“市民”看作社会的中下层，过分强调市民的低俗性。事实上，真正的“市民”是建立在现代工商业文明之上的，必然具有较高素质。由于我国城市发展缓慢，市民阶层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导致人们习惯上认为市民是处于城市社会底层的、低俗的、具有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阶层。但是，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新型劳动力的生成和新式教育的不断推广，市民大众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已成长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和消费主体，以商品交换与市场运作为生存手段的具有市民精神的市民越来越多。市民主体逐渐从“引车卖浆之流”转化为老板、会计师、经理、秘书、工程师、教师、编辑等新型市民，他们在现代工商业的经济关系中，逐渐形

① 吕微：《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载《文史评论》，2000年第2期，第125页。

② 汤哲声：《流行百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③ 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估

成了重视自我、物质理性、开拓进取、趋时求新的现代价值观念。他们的出现意味着市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现代市民价值观是市民概念的核心。现代市民价值观是市民的精神立场,也是区别传统“乡民”和现代“市民”的重要标志。它包括以人为本、物质理性、生本位三方面的内容。其中,以人为本是市民精神的核心。它不同于“五四”时期以思想启蒙为目的的自觉性的人本追求,也不同于新式文人以反封建为旨归的个性解放,而是建立在工商业文明基础之上的,由经济关系的改变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进而促使人们在精神上追求个体独立性的一种自发的人性革命。同时,它基于经济基础的转变,更为深入、缓慢与深远。“物质理性”是由市民的经济属性决定的。在工商业生产关系中,个体行为更多受到意识形态以外的物质世界的制约,从而形成物质至上、趋时求新等经济型人格。“生本位”是由市民的政治属性决定的。市场经济本质要求国家政治的干预减少,西方市民概念中对于市民自主政治权力的强调,就是基于国家政治权力的削弱。在中国,市民主要产生于官方政治势力相对薄弱的上海,普通市民摆脱了国家意识形态影响之后,更加专注于个体生活,以寻求俗世乐趣与关注日常生活为己任,从而形成了“生本位”的价值观念,解构家族和宗教权威,推崇现世的享乐主义,承认世俗生活的合法性。

为了进一步确定上海现代市民价值观的意义,我们对上海现代市民价值观、传统乡土价值观和上海传统市民价值观作一比较。

上海现代市民价值观与传统乡土价值观是相对应存在的概念。现代市民,是随着城市的出现而出现的,是城市中具有现代市民精神的居民。它不同于乡民,乡民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以土地为生产资料,具有传统农业道德的村民。乡土价值观是现代市民价值观的重要参照系,它产生于小农经

济的基础之上,被制约在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与价值体系之中。现代市民价值观具有工商业文明背景的物质理性特征,乡民价值观则在经济属性上表现出经验主义特征;现代市民价值观在政治属性上由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相对薄弱,表现出关注日常生活的“生本位”特征,乡民价值观则表现出“义理”观念;市民价值观的核心是确认个体力量的“人本位”精神,乡民价值观的核心则是关注外界力量的“神本位”精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海现代市民价值观还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上海传统市民价值观。上海传统市民价值观特指明末清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文学等以现代市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传统乡民的旧观念、旧道德。上海传统市民价值观实质上也就是乡民价值观。首先,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国市民发展历程与西方迥然不同,西方很早便有城市的传统,市民价值观发展也比较充分,而我国的市民是从传统乡民演变过来的。很多市民虽然身在城市,但心还在农村。他们过着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却无法摆脱几千年因袭的传统重负,依然秉承传统的旧观念、旧道德。在文学中,他们的价值立场表现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传统的士大夫情怀。其次,由于我国乡土社会与传统道德观的势力强大,具有传统市民价值观的小市民文学也拥有广阔的市场,甚至于挤压了一部分现代市民文学的生存空间。从明末清初的通俗小说,到鸳鸯蝴蝶派,再到40年代秦瘦鸥等人的通俗小说,这些都是市民文学的代表。而这些小说形式上的通俗性与道德上的陈旧性,也影响了文学史对于市民文学的价值判断。

现代市民小说就是把以交换为谋生手段、以工业生产提供的商品为生活资料的现代市民作为描写对象,在评判标准上反映并肯定现代市民价值观的一种小说创作。现代市民小说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都有自己的特征,但将现代市民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流派最核心的标志是:这一小说是否表现出现代市

民的生活与情感,是否揭示现代市民价值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市民小说”概念中的“现代”并非处于“现代/当代”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而是处于“传统/现代”的框架中。后者的提出,意在表明本书所讲的市民小说是与传统市民小说相对应的是一种新质的、先进的、具有新的特点与内涵的、具有某种现代性的小说。

茅盾的《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的演说》一文中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文中,茅盾认为“所谓市民,指城市商业手工业的小有产者”,^①即是与农耕文化相对立的都市工商文化的市民。曹万生认为:“城市商业手工业的小有产者”有三重含义,一是城市、二是工商、三是有产,^②即在城市从事工商业的有产者。茅盾认为的市民概念和我们在前文中界定的“市民”是比较接近的。他对市民文学的定义是“为市民阶级的无名作者所创作,代表了市民的思想意识,并且为市民阶级所享用欣赏,其文字是‘语体’,其形式是全新的、创造的,其传播方法则为口述”。这个定义中讲到市民文学的作者是无名氏,传播方式为口述,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些特征只是一些表象,反映了市场经济没有充分发展,农民生活方式还占统治地位的市民文学状况。但定义中强调市民文学是表现市民的思想意识并且为市民阶级所欣赏的叙事文学,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符合市民文学的基本内涵的。茅盾还指出了市民文学大体是一种叙事性文学,也就是以小说为主体。

结合茅盾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判断是否是“现代市民小说”,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文学是否反映了现代市民精神,是否流露了现代市民的思想感情与价值观念。紧扣这个内

① 茅盾:《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的演说》,《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848页。

② 曹万生:《茅盾的市民研究与〈子夜〉的思想资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第119页。

涵,我们就会发现,传统上认为市民文学是一种文学水平低下的文学、是反映小市民情感与生活的文学,实质上表述的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够充分的城乡转型阶段的小市民文学状况。我们传统的市民文学概念往往受这些表象的影响,而形成一些固定的习惯性认识,影响了我们对现代市民文学的接受与评价。

现代市民小说是从经济角度切入的一种叙事形态。从现代市民小说的实际形成和发展来看,经济因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包括现代市民小说的文体都受到以经济为基础的物质层面的影响。现代市民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形成的以工商业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市民阶层,反映现代市民的小说在价值观念和想象方式、叙事策略和风格特征上都深受经济影响,表现出与传统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左翼小说、追求精神高蹈的自由主义小说等其他小说形式所反映的不同的物质特征。经济方式不仅影响了现代市民小说的产生与接受,还影响了现代市民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所以,从经济的角度去规定现代市民小说重点论述的时间与地域,是相对合理的。本书将从经济的角度,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市民小说价值体系的转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发生了质的转变。物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日益紧密、都市社会的建构都使得现代文学具有一种经济的眼光。左翼文学是用一种思想的启蒙、精神的批判进行革命呼吁,而现代市民小说则用一种物质的力量描写农业王国的摧毁和工商业经济王国的建构。此前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在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起点上进行思想启蒙,在国家民族的建构下进行政治的革命叙述。而现代市民小说的出现,使得物质成为文学的一个新的关键词。

茅盾对市民文学的定义就是缘由经济学的眼光。茅盾认为中国始终有一个与封建文学相对应的市民文学,这是由中国

的农耕文化以外的另一种文化即小生产小工商文化决定的,是与农耕经济相对应的意识形态产物。虽然市民文学只占“百分之一”,而历史上各类封建文学占到“百分之九十九”,但是他认为“剩下来的百分之一,才是我们民族货真价实的文学遗产,才是我们值得去向它们学习的材料;也就是说,这百分之一中间,才有我们的文学形式,或文学的民族形式”。^①这个结论当然有武断的成分,但是体现了茅盾的一种学术价值取向,他将封建文学与市民文学对立,采取了以经济基础切入角度的方式,而非列宁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这种研究思路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的。

确定了现代市民价值观的内涵,我们可以就是否反映了现代市民价值观为标准,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梳理,从而剥离出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发展线索。从19世纪末开始,现代市民小说初具雏形,发展到三四十年代,进入鼎盛时期。解放后,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占据压倒性地位,现代市民小说的发展形成一股潜流,直到新时期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重新获得生存的合理性。因篇幅所限,本书所讲的现代市民小说具有时间与地域上的局限性。我们将要着重论述的是三四十年代上海产生的现代市民小说。

首先,本书所讲的现代市民小说主要集中于上海。这一方面是由于上海这座城市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上海现代市民小说的特殊性。上海具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特殊性。正如李欧梵所说:“中国现代文学中如果有城乡对比的话,乡村所代表的是整个的‘乡土中国’——一个传统的、朴实的、却又落后的世界,而现代化的大城市却只有一个上海。”^②从经济上

① 茅盾:《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的演说》,《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845页。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现代性的追求》,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1页。

讲,上海是以工商业发展为经济基础的现代化大都市。从事商业活动、以交换为谋生手段,以工业商品为主要生活资料的市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种脱离土地的工业生产与商业交流,形成了一种与传统乡村不同质的现代都市生存方式。基于这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形成了大批具有现代价值观念的、具有新型人格范式的新型市民。从政治角度看,上海的特殊性一方面在于中央政府对其控制力较为薄弱,另一方面受租界影响。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主要依赖于上海和长江三角洲,这使得上海受中央政府控制较小,无论在经济运行,还是思想文化方面都具有自由开放的特征;同时,对于备受争议的上海的租界制度,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它的正面意义。白鲁恂认为,通商口岸制度完全不同于殖民地制度,租界的最高行政权力虽由外国人掌握,但日常事务的实际管理权大半还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人自己在通商口岸环境中建设了“最成功的中国现代化社区”。和当时凋敝动荡的内陆农村相比,它更为充裕和进步。^①租界制度提供了较为宽松自由的话语空间、生活空间、伦理空间和政治空间,也给市民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从文化上讲,上海移民都市的品格、宽容的文化环境,促使市民价值观快速转型。19世纪中期的上海只被称为“小苏州”,明末清初的上海县城仅有10条小巷。然而到1930年上海已经是一个拥有中西移民,吸纳了明末清初士大夫文化与现代西方市民意识的新型现代化大都市。由于上海的移民性质,它不会如同“乡土中国”一样受到几千年封建文化的负累,而是在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品格:兼容并蓄、海纳百川。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具有鲜明商业文明色彩的以人为本、重义求利、物质理性、享乐主义等在传统价值观中被认为是负面的文化因素得以生存,而不是像在“乡土中国”那样受到无形的贬抑

^① 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载《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2期。

与挤压。

由于上海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以工商业文明为核心的特殊物质文化语境,上海的市民小说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和内陆市民小说不同的现代特征。擅长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老舍、张恨水维持着传统的道德感性,他们笔下的市民更像生活在都市里的乡村;而上海的市民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全新的道德立场,从19世纪末的《海上花列传》开始,日常叙事就开始被关注,而物质理性、注重生存、个性独立的市民价值观也初露端倪;张资平张扬肉欲的趣味享乐型小说一方面迎合市场,一方面巧妙转化“五四”提倡的以人为本观念,显示出现代市民物质自觉的商业观念与个体独立意识;叶灵凤的现代市民叙事则在唯美之中具有本能至上的享乐主义特征。他们的物质追求与日常生活追求预示着一种新质文学的生成。

其次,本书所讲的现代市民小说主要产生于三四十年代。经过一段时期的孕育与转型,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以经济发展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一种迥异于传统乡民价值观的现代市民价值观,并深刻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秩序,出现了具有商业特征、迎合现代市民审美情趣、反映现代市民价值观念的现代市民小说。穆时英等人结合现代城市生存经验开创了以物质理性为中心的都市公共空间叙事。40年代的张爱玲等人又从30年代令人目醉神迷的城市外部叙事回归,埋头于世俗生活,沉湎于凡人世界,形成了新的城市平民叙事方式,强调现代市民价值观的世俗层面。现代市民小说三四十年代发展到鼎盛时期,与当时的左翼小说、自由主义小说分庭抗礼,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1945年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上海经济上的优势与政治上的独立地位逐渐丧失,现代市民小说随之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走向衰落。主要的现代市民小说作家逐步流失,现代市民小说进入了潜隐状态。直到新时期上海等城市又重新在经济和政治上获得类似于20世纪三四十

年代的历史条件,现代市民小说才又重新出现,再获新生。

上海现代市民小说早在 19 世纪末就开始萌芽,一直绵延发展到当代文学,从中我们可以依稀辨认出一条或清晰或潜隐的文学发展线索。在这个过程中,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现代市民小说较为典型地表现了现代市民小说的叙事形态与文体特征,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叙事文学。但要注意的是,这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现象,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工商业生产关系的发展,具有现代市民精神的文学必将日益增多,狭隘的地域性状况也会有所改善。

本书试图通过比较的方法探讨“上海现代市民小说”这一概念的文学史意义。现代市民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左翼小说、自由主义小说等叙事流派的区别,是相对并立的关系,也是确立现代市民小说文学史意义的一个重要途径,对此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重点论述。本章重点对现代市民小说、海派小说和都市小说几个类似的概念进行辨析。

现代市民小说与海派小说、都市小说涵盖了相似的地域、时段和文学现象,具有某种重合性。但是三者的出发点和角度不同。海派小说从地域的角度表现发生在上海的特定的文学现象的特殊性;都市小说从都市文化的角度表现都市的发展对文学的影响;现代市民小说则从经济发展中“人”的变动表现这种文学现象的普遍性。海派小说强调的是地域性、特殊性,现代市民小说强调的是非地域性、普遍性;都市小说采取的是文化视角,现代市民小说采取的是“人”的视角。

三种小说概念所属的坐标体系和解释框架也各有不同。海派小说与京派小说形成一个二元对立的文学诠释框架,都市小说与农村小说形成一个二元对立的文学诠释框架,现代市民小说则从“人”的角度与传统乡民小说构成二元对立。在我国,几乎没有乡民小说这个概念。但是,由于我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形成了介于乡民与市民之间的“小市民”阶层,因此以鸳

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市民小说价值重构

鸯蝴蝶派等为代表的小市民小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我们在讲到现代市民小说时,重要的坐标参照系就是小市民小说。

都市小说和现代市民小说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研究文学都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都市小说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盛而形成的一种文学类型,现代市民小说则是侧重于描写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兴盛,市民的价值观念发生改变而形成的文学图景。相比较而言,都市文学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除了都市中的市民以外,还包括都市建筑、文化、传媒等多方面的景观。且都市小说和现代市民小说关注的对象、研究角度都各不相同。都市小说的研究对象是都市。都市的发展,带来了现代城市景观的改变、自由话语空间的形成、民主意识的兴盛、制度的改革、经济力量的渗透、市民理性的形成、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发展,这些城市文化的特征影响到文学的特征,都市小说关注的就是在都市文明的影响下文学状况的改变;现代市民小说关注的只是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市民,研究他们在经济的变动中价值观念的改变,和这种观念转换对文学的生产与消费的影响。都市小说以文化作为切入角度,现代市民小说则以“人”作为观察对象。李俊国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就是从都市角度切入,探讨都市文学经验和都市言说方式,从都市角度对中国现代小说进行梳理。

海派小说与现代市民小说的区别也是一个重点。什么是海派,可谓众说纷纭,到现在没有定论。其中对海派研究比较深入的吴福辉先生曾经下过两个定义,广为流传。他认为“取上海市民的眼光来打量上海这个当时的东方大都会,来写这个中国本土边缘上的‘孤岛’”是海派的共同特征。^①随后,他又在专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中指出:“所谓海派文学,第一,它应当最多地‘转运’新的外来的文化,而在20世纪之初,它特

^① 吴福辉:《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第5页。